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思想·前沿·争鸣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Principles of Optim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发展战略的 成本与收益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最优政府干预原理

付才辉
著

新结构经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思想·前沿·争鸣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Principles of Optim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发展战略的 成本与收益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最优政府干预原理

付
才
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优政府干预原理/付才辉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9

(新结构经济学丛书)

ISBN 978-7-301-29880-0

I. ①发… II. ①付…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IV. ①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7044 号

书 名 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优政府干预原理
FAZHAN ZHANLÜE DE CHENGBEN YU SHOUYI—JINGJI
FAZHAN GUOCHENG ZHONG DE ZUIYOU ZHENGFU GANYU
YUANLI

著作责任者 付才辉 著

责任编辑 任京雪 李 娟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880-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经管书苑 (pupembook)

电子信箱 em@pup.cn QQ: 552063295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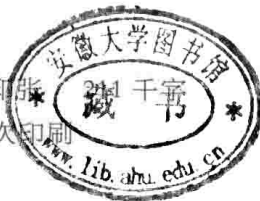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探索著作是我博士论文的主要内容。^①一晃眼,博士毕业竟几个春秋。在此期间,我将博士论文的各个章节修改成论文刊发在一些学术期刊上。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关注,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

记得六年前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我计划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真实关系为选题。然而,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真实关系纷繁复杂,各种论述文献也汗牛充栋。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后,我最终选择了当时并不成熟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博士论文的理论视角。要知道,林毅夫教授在2011年才正式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一词,作为中规中矩的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说是充满了理论冒险精神。当然,这也要特别感谢我在厦门大学经济学系的博士生导师林民书教授,他充满了佛性,以慈悲为怀放任我任意选题写作博士论文。有导师的庇护,我的博士论文肆无忌惮,天马行空,充满任性。然而,林民书教授觉得以“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第三波发展思潮的理论探索与中国经验”为主标题难以全面覆盖这篇庞杂的博士论文,他担心论文外审被挂,于是断然将主标题去掉,以副标题作为主标题。林民书教授的担心

^① 还有一部分关于中国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内容没有纳入本书,后来我在此基础上拓展成另一部工作手稿《中国的城市化: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15年)。

是多余的,我的博士论文不但顺利地通过了外审和答辩,而且获得了林毅夫教授的“佩服”,他还主动邀请我来北京大学做他的博士后。于是,我与林毅夫教授结下了师徒之缘,于2014年初春正式开启了探索新结构经济学的人生模式。

随着对新结构经济学学习、研究和应用以及教学的深入,我蓦然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十分庞大,这是一门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学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九牛一毛。过去两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课上,为了便于学生把握新结构经济学的全貌,就不揣浅薄地将其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然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占据十大原理的两个席位,足见其在新结构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不但克服了第一波旧结构主义发展思潮强调政府而忽略市场的政府盲目干预主义,以及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强调市场而忽略政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而且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对立范式转换为辩证范式(参见本书绪论)。这种政府和市场关系范式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给定禀赋结构求解最优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在研究范式上替换了以给定生产函数求解资源最优配置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①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范式中,政府与市场作为两种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争论的焦点在于谁优谁劣。然而,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范式中,研究的焦点在于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林毅夫教授在目前的新结构经济学体系中详细分析了结构变迁过程中政府作用的正反两个方面:正面作用是促进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结构变迁的因势利导作用;反面作用则是违反潜在比较优势的错误

^① 对新结构经济学范式的基础理论探索是我博士后出站报告的主题(付才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价格理论——一项对新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探索”,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6年),读者也可进一步参阅下面的文章: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第81—103页;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第3—44页。

干预,比如众所周知的赶超战略。我将这个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九条“结构变迁中政府因势利导原理”。然而,如前所述,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实纷繁复杂。这个因势利导原理只是一个基准,难以概括经济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所内生的两难困境,比如政府干预在发展机会与投资潮涌以及产能过剩之间的内在矛盾(参见本书第2、3章),政府干预在经济增长与部门以及群体之间的内在失衡(参见本书第4、5章),等等。以这些发展过程中的两难困境为例,本书初步构建了一个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参见本书第1章)。我也抱着野人献曝的态度,将本书的中心思想概括为新结构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十条“结构变迁中最优政府干预原理”。本书浅尝辄止,远未囊括这一原理所涉及的政府干预在结构升级与结构失衡之间的诸多矛盾现象,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完善。

借出版拙作之际,我要感谢家人、朋友和同事在我求学和工作上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林民书教授和博士后导师林毅夫教授,很幸运有两位林老师的栽培。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郝小楠和任京雪编辑,除了本书,她们也帮助我编辑了《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报告》《新结构经济学案例研究》等新结构经济学系列著作,这些新结构经济学著作也凝结了她们的诸多汗水,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林君秀老师对新结构经济学系列丛书的策划和指导。

付才辉

2018年初春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目 录

绪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	1
1 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一个分析框架	11
1.1 引 言	11
1.2 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	13
1.3 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	14
1.3.1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比较优势”分析思路的争议	14
1.3.2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动态性质的争议	15
1.3.3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制度基础的争议	16
1.4 政府和市场的交互机制	17
1.5 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	22
1.6 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	27
1.6.1 制度及其分层(分类)	27
1.6.2 政府、契约与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28
1.6.3 政府、产权与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32
1.7 结论性评述	36
2 政策闸门、潮涌通道与发展机会	44
2.1 引 言	44
2.2 理论回顾、争鸣与拓展	46

2.2.1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回顾	46
2.2.2	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论	49
2.2.3	一个拓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51
2.3	市场自身为何难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53
2.4	潮涌通道的识别与成因	55
2.4.1	价格通道与成本通道	55
2.4.2	政策闸门：潮涌通道的形成	58
2.5	政策组合的权衡取舍：产能过剩与发展机会	65
2.6	光伏产业案例	67
2.7	结论性评述	68
3	金融干预的成本与收益：产能过剩与技术进步	74
3.1	引言	74
3.2	中国工业行业经验的特征	78
3.3	金融政策的产业发展性质与干预形式	81
3.4	微观投资协调博弈模型	83
3.4.1	博弈结构	83
3.4.2	博弈结果	83
3.4.3	政策闸门在发展机会与投资潮涌上的两难取舍	84
3.5	宏观新古典-熊彼特混合增长模型	85
3.5.1	新古典资本演化方程	86
3.5.2	熊彼特发展过程	87
3.5.3	政策闸门在发展机会与投资潮涌上的两难困境	90
3.6	经验分析	92
3.6.1	计量模型设定	92
3.6.2	变量与数据	93
3.6.3	回归结果	95

3.6.4 基于产能利用率的稳健性分析	98
3.7 结论性评述	100
4 为增长而失衡	106
4.1 中国式发展的特征：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形影相随	106
4.2 中国式发展的缘由：寻找政府主导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	107
4.3 结构失衡：概念与测度	115
4.4 政府主导经济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117
4.5 为增长而失衡的机制	124
4.6 结构失衡的经验分析	132
4.7 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144
4.8 增长与失衡伴生关系的经验分析	153
4.9 结论性评述	159
附录 4.1 平衡增长路径(BGP)存在性的证明	160
附录 4.2 “为增长而失衡”理论命题的证明	162
5 市场、政府与两极分化	171
5.1 引 言	171
5.2 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假说	174
5.3 基于跨国经验的理论假说	181
5.4 基本模型	187
5.5 模型的总量与结构动态一般均衡系统	195
5.6 时间偏好异质性、两极分化与不平等的动态	200
5.7 内生时间偏好：“上帝的归上帝”——市场的问题 市场解决	211
5.8 市场的问题政府解决——两种政府干预方式	213

5.9 只存在政策异质性：“恺撒的归恺撒”——政府的问题
政府解决 220

5.10 两极分化警戒线模拟与政策倾斜触线的数值实验 221

5.11 结论性评述 226

附录 5.1 中国城乡群体和人均收入与消费的分布及其动态 227

附录 5.2 相关公式推导 233

绪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以下简称《摘编》)一书,第三篇重点阐述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一些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则不这么辩证地看,在其学科传统中,市场和政府是两种非此即彼、对立的资源配置方式。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推理方法和辩论方式存在几波主要的针锋相对的范式。^②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经典的推理方法和辩论方式是建立在斯密“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完全竞争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能够通过完全竞争市场实现。在这一理论范式中,政府

① 本章原载于《审计观察》2017年第3期,感谢博士后导师林毅夫教授和《审计观察》曹伟主编的有益建议。

② 关于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可参考一些详细的综述文章: Bardhan, P., “State and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a Reappraisal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6, 54(3): 862—92。

只需充当“守夜人”。

但是,很快经济学界就认识到这是太理想的情景,极不现实。例如,庇古所指出的外部性,引发了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讨论。不过其后,科斯所指出的外部性的私人解决方法,再度扭转了针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讨论。

除庇古与科斯之争外,信奉市场竞争的芝加哥学派和信奉市场过程的奥地利学派关于自由市场、竞争本质与政府反垄断作用也引发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学之争。不过,这些主要基于西方市场经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间的市场与政府之争,于发展中国家急切的经济发展的言可以说是隔靴搔痒,本质上相去甚远。

对后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主流经济学影响深远的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争论,莫过于兰格和哈耶克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战。^① 哈耶克认为,由于各个决策者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分散,只能由市场的竞争来处理;兰格则提出,计划者可以用模拟市场价格的试错法来解决信息的问题。伴随苏联计划经济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成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萧条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强调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横空出世,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革命,这使得战后第一波旧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思潮对市场极度不信任、对政府过度热情。不过其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艰难历程,以及理性预期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又使得第二波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思潮对政府极度不信任、对市场过度热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西方理论界主宰发展中世界的两波代表性发展思潮。

^① 当时学界的看法是兰格获胜,而非哈耶克获胜。在兰格和哈耶克的争论中,俩人都假定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企业所在的产业都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计划经济失败,学界又认为哈耶克获胜,其实让哈耶克获胜的原因是苏联计划经济中的重工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而不是兰格的模拟市场定价试错法的失败(参见: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然而,实践与理论的深化,使得在旧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范式下,政府与市场之争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比旧结构主义更加糟糕;以机制设计理论为代表的微观经济学前沿进展,也证明在诸多不满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情景下,政府比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姑且不论这两波发展思潮在实践上的失败,即便退缩到理论堡垒中,科学研究的进展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基于信念偏好相互攻讦。例如,机制设计理论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一个进步,便体现在对具体情景的具体分析,尤其是具体情景因素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效率优劣的比较静态细节上。^①但遗憾的是,这些新近的理论依然将市场与政府视为一种替代关系。

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一些训练有素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经济学家一碰到政府作用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产业政策”,便机械地把它与“计划经济”画等号。显然,一些所谓“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摘编》一书的论述,可谓南辕北辙。

《摘编》一书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驳斥西方主流理论的实践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每一时期都未遵循当时所谓主流发展思潮的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东亚奇迹”,这为研究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了新的转机。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将“东亚奇迹”中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相关争论归纳为三派:亲善市场论(market-friendly view)、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 state view)、市场增进论(market-enhancing view)。亲善市场论认为民间部门能够解决绝大多数

^① Acemoglu, D., M. Golosov, and O. Tsyvinski, “Markets Versus Government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8, 55 (January): 159—189.

市场缺陷,国家推动发展论视政府干预为解决市场缺陷的主要工具,而市场增进论则强调政府政策的目标被定位于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

世界银行 1993 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以下简称《东亚奇迹》)被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争论上的一个分水岭。正如经济学家罗德里克(Rodrik, 1994)所言,这要感谢世行的研究,人们不再继续坚持认为,是因为东亚地区的政府极少对经济进行干预才使东亚经济表现如此不俗;或者,如果政府不过多干预,东亚经济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这一贡献极有价值,因为人们对东亚问题的讨论如今可以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了,有了更高层次的共同理解。

然而,《东亚奇迹》的这项开创性研究存在一个缺陷: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奇迹。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于 1994 年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分析了内生于赶超战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转型过程,将“东亚奇迹”采取的发展战略称为“比较优势战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经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称为“赶超战略”,并对比两者的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做了界定。在实行赶超战略的情况下,为了支持一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投资和运营,人为干预经济、扭曲市场和价格信号、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赶超战略的内生要求。因此,政府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以至于伤害经济发展过程,这几乎是必然的;而且,除非改变这种发展战略,否则这种政府干预是无法根除的。

在 2012 年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一书中,林毅夫将比较优势战略分析框架提升为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作为第三波发展思潮,进一步阐述了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和操作流程,即“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这不但奠定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辩证关系的理

论基础,还提供了政策操作工具。^①

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市场”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和产业,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在给定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下才会最有竞争力,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和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和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提升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市场”。

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政府”也必不可少。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效率更高的新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

^① Lin, Justin Yifu, and Célestin Monga, “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Dynamics of Structural Change”,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1, 29(3): 259—310。关于新结构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最早系统论述体现在《中国的奇迹》一书1999年的增订版第4章“比较优势战略”第4小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或成功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因此,政府必须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一定的激励,这样才会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进行的,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个人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能的员工,从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

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通常也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与之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市场范围和交易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而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前沿,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此种困难如果不予以解决,和同样在这些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已经解决这些困难的国家中的企业相比,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面临更大的风险,而使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因为要素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相加的总费用太高而缺乏竞争力。因此,需要一个“有为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或者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

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并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与社会回报做出甄别,就如同“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利用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推动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上述分析,林毅夫将市场和政府的有机而非对立关系的原理概括为: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把结构引进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探讨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结构变迁过程中各自的作用。这种有结构的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政府的作用,自然不会完全等同于没有结构的、处于静态状况的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守夜人”政府的作用。有必要讨论的是,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的动态上政府应该做的与稳态时应该做的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应该如何随发展阶段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除了这种原理性的论述,新结构经济学还为现实中复杂的市场与政府关系提供了分类分析框架。^①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公共部门经济学》开篇所描述的,从生到死,我们的生活总是受到无数形式的政府活动的影响,要定量描述政府活动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②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我们可以对结构变迁与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活动进行归类:首先,按照逻辑来分类,政府要么是什么都没做——“无为”(无为而治),要么总做了些什么。其次,按照政府是否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分类,政府的行为要么是“乱为”(违背规律)——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

①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及其在转型升级中的应用”,《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5期,第133—145页。

②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第三版),郭庆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